

# 導論

## Introduction

### ■ 數位人文的變與不變

The Change and Unchange of Digital Humanities



# 數位人文的變與不變

項潔\*、翁稷安\*\*

## 摘要

本文以史學方法中「史無定法」的觀念為例，說明傳統人文學在研究的方法上，本身即保有開放的態度；在數位時代的今日，與資訊技術合作，開展出新的數位人文研究，是符合人文學傳統的進步。

在學科專業化的今日，現階段數位和人文最好的合作方式，可能是打造成一個溝通、開放的團隊。本文認為數位人文是數位時代人文研究的一種新的方式與選項，是一種助益而不是傷害，它分享人文學不變的堅持和執著，也體現著人文學對方法的開放和創新。這變與不變的平衡和掌握，將會是投身於此領域的學者，全力以赴的挑戰。

---

\*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碩士後研究員。

# The Change and Unchange of Digital Humanities

Jieh Hsiang\*, Chi-an Weng\*\*

## Abstract

Starting from Yu Ying-shih's thesis that there is no fixed methodology for historiograph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at it is within the very nature of the humanities to explore new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hat respect, utilizing digital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umanities research conforms to the progressive nature of humanities scholarship.

In today's world of specialization, the most promising mod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might be to build a team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at is both inclusive and interactive. This Introduction points out that digital humanities is a novel and significant option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and does not represent a harmfu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Such collaboration also embodies “the unchange” elements of the humanities—persistence and perseverance—as well as “the change”—openness and innovation. The decision of w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what should not be changed, then, will be a major challenge for scholars in this field.

---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SI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Research Associate, 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一、本書內容簡介

本論文集是「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集結，這已經是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連續三年舉辦這個會議，離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每年一度常態會議的目標又更向前邁進了一步。之所以會有這個想法，原因在於數位人文發展的研究方式和型態裡，不斷的對話與交流是最為重要的關鍵；這樣的對話應當是寬廣而多元的，跨越不同國界、不同研究議題、不同技術領域。我們相信唯有經由集思廣義，吸引更多研究者投入，才能彰顯數位人文作為研究方法的價值和意義。在這三屆的研討會中，可以明顯感受到數位人文這個議題，不管是在研究的量或質上面，都有著長足的發展：研究的議題增加，越來越多的人文研究，嘗試應用數位的技術進行處理，建立越來越專精的研究系統或典藏資料庫；研究者的背景也更形多元，許多人文出身的研究者，開始留心甚至主導數位與人文的結合；更多的數位技術被納入數位人文的思考，無論自然語言、3D呈現等新穎的技術，開始被思考和人文議題結合的方式與可能。讀者眼前的這本書，可以說是這蓬勃景象的一個縮影。

本論文集共收錄了九篇文章，可粗略分為兩個部分，代表著現階段數位人文領域發展的兩種主要類型。一類是文字的分析，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收錄的文章，即為此類。在第一部分對檔案的分析中，〈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於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初步應用〉企圖結合自然語言的資訊技術和傳統史學文獻分析，試圖析理出結合的可能。〈以文本分析呈現臺灣海外史料政治思想輪廓〉則用數位技術，綜觀而量化的去分析過往政治思想史所研究的場域。第二部分將焦點放在具體的議題上，應用數位技術做大規模的語意分析，〈結合漢典古籍虛詞常見字與統計量化分析進行漢譯佛典譯者風格辨別〉一文從大量的佛教經典的字句整理中，去回答譯者風格，這是佛教傳入的重要課題。〈「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提出了新的理論視角，賦與詞頻分析新的詮釋，並以「華人」這個觀念做具體的實驗。〈漢語方言語音資料庫自動擴增補充方法〉則是希望能應用數位科技，去處理語言學中十分困難的方言問題。上述這些研究，所面對的都是十分龐大的文本資料，而它們所努力達成的目標，都是以人力所十分困難達成，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心血的課題。

數位人文研究的第二類關懷則是在呈現上，如何用新技術去展現過往文字所不能負載的成果，本書第三部分即屬此類，並將焦點置於GIS技術的呈現上。空間一向是人文研究所看重，卻又最常被忽略的部分，如今透過GIS技術，學界始逐漸填補這個斷層。〈京都大比例尺地圖（京都市明細圖 *Kyoto-shi meisai-zu*）數位化〉、〈數位典藏應用的社會效益與永續經營——以阪神大地震資料3D視覺化為例〉、〈「太平洋史前 Lapita 陶器線上數位資料庫」的建立與運用〉，三篇文章的關注點各

不相同，無論是針對底圖、3D視覺化或對具體應用等等不同的開發，但其共同之處便是要將空間帶回人文學的關懷之中，提供新的從地理資訊出發的思考角度。此外，筆者於本書中另有一文，〈多重脈絡——數位檔案之問題與挑戰〉旨在說明數位系統對脈絡探勘所能帶來的協助，同時結合了文字處理和圖像呈現，試圖討論數位人文所能開啟的全新研究視野，是我們長期以來在這個領域中努力的一點體會與想法，就教學界。

在這篇〈導論〉中，則想換個角度去討論數位和人文之間的關係，本文將就人文學界對數位人文的接受與否為主要的焦點，在第一部分將以史學為例，說明在傳統人文學中，對新方法的開放心態；第二部分則承續第一部分的討論，試圖勾勒出數位和人文兩者在現階段的合作可能。如果〈多重脈絡——數位檔案之問題與挑戰〉一文是由專業論述的角度表明數位人文對傳統檔案研究方式所能帶來的改變，那麼本篇短文則希望能用對話、一般性的立論，寬泛討論人文學者對數位人文新方法所應持的開放心態，兩文立意雖略有出入，但仍可併觀。需特別強調，數位和人文兩者之間的對話，應當是一個沒有止境、不斷持續的過程，「數位人文研究叢書」的出版，其內每篇文章都是這樣努力下的嘗試，而非最後的定論。對我們來說，能讓這樣的對話不斷延續，成為引玉之磚，促使相關研究和見解的蓬勃發展，才是我們最終的期盼。

## 二、從「史無定法」談起

讓我們先從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這篇文章談起，該文寫於1981年，作為《史學評論》這份刊物的發刊辭。文章一開始便指出現代史學雖擁有深厚的學術傳統作為後盾，但在當下已面臨衰落的處境，這是人文或社會科學在20世紀後半中國學界的共同困境，史學的研究本質上即為「綜合貫通之學」，「必須不斷而廣泛地從其他學科中吸取養份」，所以人文社會研究整體的不彰，必然對史學造成很大的影響。作者回顧過去中國史學的發展，可以歸結為兩個主要流派：一是以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訂、辨偽為核心任務的「史料學派」；另一則是主張從系統、理論的觀點對中國史進行全程通釋的「史觀學派」。兩者在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中，呈現對立。作者以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說法，指出雙方其實各捕捉到史學的不同面向，各有利弊，並對兩者皆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但也指出兩者本身雖有缺陷，但各自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兩者皆顯示了近代史學追求科學化的不同途徑，在反省和調整後，仍是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立足點。

那麼如何具體的以前人成果為基點，開展出史學研究的下一階段？余英時提出了幾點觀察和建議：(1)史學作為一種通貫之學，必須不斷從其他相關學科「吸取養料」。這是一個高遠而略顯抽象的理想，從過去的訓詁或語言之學，到今日社會

或自然科學在這標準下皆可和史學相結合。但在學術日趨專業化的情況下，作者指出「綜合貫通」是有一定限制的：「史學家在研究某一時代歷史事象時不但一方面要照顧到該事象在其前後時代中貫時性發展的線索，另一方面則要顧及共時性的橫向關係。這和社會學家去尋求、擴充通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歷史學家只是要從史學研究的需要去找尋「涉及」的部分即可，是「要看研究範圍的『切己』情況而定」。(2)作者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指出不論近代何種史學派別，都強調自身所持有者為最新的科學方法，形成了一種流行的觀念：「史學的進步主要是靠史學方法的進步」。余英時認為所謂的「史學方法」包含兩個不同層次，一是將史學方法等同於一般科學方法，只是應用的研究場域不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即屬此類。第二層涵義則是應用各種專門學科的具體分析技術去處理歷史問題，作者特別點明：「史學家當然也有他獨特的一套工作程序，如確定證據，建立史實，發現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解釋變化等等，但是這些工具卻是與其他學術的發展息息相關的。」也因此各個不同研究領域內的「新學術的興起有時開拓了史學家的視野」，令史學研究者可以對「證據」、「史實」有新的了解，很多不被當作「證據」、「史實」的對象，也因之被賦與了重新解釋的空間。作者強調這樣的立論不是在證明史學為一門無方法論的學問，而是「史學的確沒有固定的方法；在技術層面上，史學是在不斷地吸收其他各有關科學的方法以為己用的」。此即「史無定法」的主張，符合了史學綜合通貫的性格。

史學家必須不斷吸收新方法，並且是具批判、不盲從的篩選新方法的運用，誠如余英時所總結的：「史無定法，而任何新方法的使用又隱藏著無數的陷阱；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在史學研究上沒有捷徑可走的，一切都要靠史學家自己去辛苦而耐心地摸索。」這是史學的困難和吸引力之所在。(3)最後，余英時提出對史學未來發展的期待：「希望史學研究可以逐漸使我們從多方面去認清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的過程；……更希望這種對過去的確切瞭解可以照明我們今天的歷史處境。」更具體的說，即是在肯定文化有型態，以及歷史連續性的前提下，通過歷史研究，去尋找並解釋歷史發展的趨勢。在文章的最後，作者以「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來勉勵後進，在認清了中國史學研究現階段的任務後，便要對具體、關鍵性的問題反覆分析與綜合，並指出可以借鏡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 Merton）的「中距程理論」（the middle-range theory）。（上述兩段整理自余英時，1982）

這篇文章在當時便引起了很大的重視，可說是中國史學研究的定音之作，《史學評論》在數期後還不斷邀請各方學者專家對這篇文章進行回應和討論。余英時先生這份對史學的建言與期許，距今已三四十年的時間，其中的幾個重要觀點，即便在今日看來仍歷久彌新，深具振聳發聵之效。之所以如此重要，因素很多，最根本的關鍵，在於這篇文章回應了中國史學研究的危機，並從宏觀的角度，提出一個具體可行的方向。事實上，史學是個危機感很重的學門，原因之一可能是史學本質的

問題，或許，作為一個探究過往真實的學問，隨著真實的難以測知，史學的研究目標很容易被視為唐吉訶德式的努力，過往的真實就像一個永遠難解的謎團，任何企圖接近的努力似乎最後都僅是徒勞無功的自說自話。另一方面的危機，則是來自更現實層次的挑戰，即在面臨各種學科，諸如社會科學的影響時，史學如何還能保有自身學術規範的獨立和自主。當各種新的社會學方法和解釋紛紛出現時，史學這一學門的價值究竟何在？歷史研究不當只是破碎的考證，也不該只是特定理論架構的附庸，它應當有其自身的價值，而且還是對當代有所幫助的價值。後者成為〈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一文主要針對的目標，並提供了明確而具體的解答，而後者答案的確立相當程度便回答了前者，畢竟要回答對史學的質疑，最實際的方法不是在玄虛的理論之間打轉，而是用實作的方式，以實績去回應所有的懷疑，否則爭論再多只不過是空談而已。是以，當我們一旦確立了史學和其他學門之間的關係，便能在人文科學龐雜、巨大的意義之網內，找到安身立命之處；換句話說，從方法論上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有其不容抹殺、跨越時代的重要意義，而這也正是〈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一文最大的價值所在：強調史學「綜合貫通」的性質，並以「切己」為標準，兼容並蓄各種不同的學門。海納百川的結果，不僅回應來自不同領域的挑戰，也彰顯了歷史研究的核心關懷。

這也是我們在討論數位方法和人文研究之間關係時，特別提及這篇文章的主因；數位科技之於人文，簡單來說就是為人文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擴充，以史學這個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文學門而言，即是在其綜合貫通的本質之內，提供研究者一個觀察過去的新方式和新選項。方法本身不可能取代學科本身，任何方法也均不是藥到病除的神丹妙藥，使用者和方法之間，不論任何領域，原本就是一個不斷磨合、糾正、適應的過程，唯有透過彼此的溝通和學習，才能達到駕輕就熟的境界。對方法不經檢討的迷信是不可取的，同樣的，對方法直覺或主觀的排斥亦非正確的態度。方法應該配合使用者的需要而不斷修正，不當只是為展現效能而展現；同時方法的開發也應跳脫使用者想像力的限制，幫助使用者看到下階段的可能。要能達成這個目標，使用者就必須用更開闊的態度去面對新方法的出現和改良，促成對話的開展。

對新科技的疑慮與不信任是人類永恆的難題，這或許也是數位人文所背負的原罪，但「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至少在研究方法或工具的層次上，數位技術對人文研究所帶來的幫助是明顯的，它讓研究者可以節省更多的時間和心力，專注在課題鑽研和思考，更貼近過往的人事物。方法的變化，會帶來研究視野的變化，也會促進研究者對議題的深化，但並不會影響人文學的本質，再以〈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所言為例，數位的新方法本身並不違反史學，甚至完全符合「綜合貫通」海納百川的研究傳統，而史學作為人文學門的核心關懷絕不會「役於物」

的被方法所取代，事實上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數位方法的便利能令研究者專注於對史學的核心關懷；史學的核心關懷則能令數位方法脫離破碎的枝節或炫技的展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構成了史學的變與不變，史學如是，人文學亦然，一個優秀的人文研究者，應當在不變之處堅持不懈，而在可變之處與時俱進。

### 三、數位與人文，在數位環境下的人文研究

讓我們再回頭思考「數位人文」究竟為何的根本問題。誠如前述，這是任何一個投身或關注此領域的研究者，都當不斷思索、面對的問題。我們無意提供一個「權威」的答案，因為這樣的答案無疑會限制數位人文發展的空間和想像，這是我們所不樂見，也是違反數位技術追求日新月異的本質。我們僅能從現階段的成果和嘗試，賦與一個寬泛的定義，並期待不斷的深化和演進。在本系列第一本《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的〈導論〉中，我們為數位人文提供了精簡的界定：數位人文「指的是那些唯有借助數位科技方能進行的人文研究。反過來講，數位人文的研究，即是企圖尋找在前數位時代中難以觀察的現象、無法想像的議題與無法進行的研究。這樣的定義或仍不免顯得寬泛，但正因如此，它能夠容納比較多的可能性——對於初生的領域而言，與其畫地自限，這樣的可能性應該更為重要。另一方面，這個定義提醒我們，數位人文研究應該專注於真正的突破，並帶來概念上跳躍性的發展（conceptual leap），而不只是小規模的改善。」（項潔、涂豐恩，2011）

這個定義反映了我們對「數位人文」深切的期許與盼望，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取法乎上」的高標準，一方面期待它能彌補人力所無法觸及、難以觀察到的角落，並帶來概念上的跳躍；這也是我們一路以來一直努力的目標。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只能以高標來界定數位人文，會特別以此標準自期，只是對數位人文這樣的一個新興的領域來說，「畫地自限」是嚴重的致命傷，如同古語所云朝「取法乎上」的目標努力，最少能有「僅得乎中」以上的結果，甚或在無數次的嘗試之後，才有開創概念的契機。是以，我們並不是要否定傳統的人文研究方式，要能達到「唯有借助數位科技方能進行的人文研究」，顯然需要以傳統研究方式作為借鏡和學習的對象。從這個角度出發，如果「畫地自限」是數位人文在發展階段最大的致命傷，那麼第二項所該避免的則是「數位」和「人文」的對立。顧名思義，「數位人文」就是「數位」和「人文」兩種不同領域的有機融合，而不是對立，兩者之間不當存有鴻溝。一方面在業已步入數位時代的今日從事人文研究，多數研究者皆或多或少開始應用數位科技或使用相關數位資料庫，數位科技已走入了人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人文研究自無置身於外的可能，頂多僅是程度多寡的差別。另一方面，數位科技和人文兩個不同的學門，雖然有極為不同的思考背景乃至學科訓練，這樣的差異不當被視為是隔閡，它反而是可以彼此刺激、相互影響而激盪出火花的動力。要能達到

這個目的，數位和人文兩造之間就必須進行充分的對話，如同上節所提及的，單只是技術的開發，在沒有人文素養的問題意識為導引下，往往很難碰觸到問題的核心；反過來說，不管是何種領域的人文研究者，為了要觸及自身研究的核心關懷，都應該殫心竭慮，用盡各種方法去進行理解和探勘，不當自囿於先入為主的成見。在雙方都持開放的心態下，持續的溝通，數位科技的研發者可以理解人文學者在處理議題時的思維和限制，人文的研究者可以去理解資訊學者在開發技術時的考量和盲點。一旦能開始這樣的對話，數位和人文兩造之間的有機結合，才能真正落實，不僅只是「高貴的夢想」。

換句話說，前段所描述的數位人文運作，就是一種團隊的運作模式，這很可能是當下最適合的數位人文的運作模式。當然如果人文學者能具有程式能力，或者資訊工程學者可以獻身人文研究，是最理想的狀態，因為親身投入、橫跨兩個面向者，最能掌握彼此的需要及箇中的甘苦，也不會有溝通不良的情況發生，但在學科日益分工、專精的今天，要同時能身兼兩個領域，確實是有現實的難處，資訊專業需要花時間理解，人文素養亦需長期的涵養，我們期盼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數位人文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日漸受到重視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願意投入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和思考，進而出現能夠充分掌握兩端的研究者。勒華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1970年代那句充滿危機的預言：「明日的史家，為了要生存，都必須要先學會電腦的程式語言。」四十多年過去證明是有些過慮了，也許我們可以用比較正面的角度，將這段話重新詮釋，史學或任何人文學科都有自身的學科規範（discipline），有其不容被輕易取代的獨立性，數位技術帶來的是助益而非挑戰。要能充分的掌握這項技術，擴充自己的學門的研究可能，研究者可能要對資訊技術有初步的認識，如果要期盼有更進一步的需求，最快速而簡單的方式，便是和資訊背景的學者合作，以團隊的方式進行數位人文的探查。讓我們再借用勒華拉杜里的譬喻略加修改，數位技術的加入，其目的不是為了讓人文學能「生存」，而是要讓人文學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這並不是我們獨創的觀察，知名的史學研究者黃寬重教授，也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出發，提出類似的見解。在民國100年10月中，在紀念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三十週年所舉辦「臺灣漢學新世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學術論壇」裡，黃教授以〈數位時代人文研究的衝擊與蛻變〉為題發表演講，該次演講後來以文章的型式，刊登於《漢學研究通訊》中（黃寬重，2012），國家圖書館數位影音服務系統亦保有影音的錄像。<sup>1</sup>在該次演講中，黃教授以親身參與的經驗，回顧臺灣史學研究從1984年以來，近三十年的時間進行相關數位化的成果，並提出數位資源對人文研

1 網址見：<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cid=588499&PlayType=1&BLID=5188089>（最後確認時間：2012年7月6日）

究所帶來的助益和衝擊。在助益的方面，他將傳統文本數位化的優勢，歸納成下列四點：「首先，典藏原件能夠在不影響公眾利用下，獲得更好的保存，甚至永續典藏。其次，經數位化後，文物典藏圖像資訊可透過便捷的網際網絡，不限次數送至任何地點，有效突破地域限制。再者，數位資料可透過建置後設資料與聯合目錄，將各類資料彙整分類，便於利用。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數位資料能極快速搜尋檢索。」這四項功能，「最終有助資源共享、消弭區域差距，達成不分地域、種族均能公平地利用人類公共文明資產的理想」，是自印刷術發明之後，人類對掌握知識方式的最大革新，「不僅造成資料蒐集、整理、分析等有形研究過程的顯著今昔差異，龐大而易於利用的數位資源更有助研究者整合不同領域，進行跨時段、跨地域的長期觀察」，總之，黃教授認為數位技術對人文研究的涉入，重新定義了傳統所謂「博學」的概念，刺激了各種創新性的研究和說法，臺灣史學界黃一農院士所提出的「E考據」和哈佛大學包弼德教授主持的「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相關計畫，都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些優點卻也替人文學者帶來新的衝擊，黃教授指出了下列幾個影響的面向：首先是數位資料庫的品質良窳參差，其原因一是出於商業利益帶來的粗製濫造，加上在建置資料過程中專業知識的不足。其次，資料取得的便利，將增加使用者對資料解讀的門檻，面對能快速獲取的龐大資料，在「缺乏該領域專業訓練與研究資源先備知識」的情況下，反而對研究是種傷害。其三，以數位的方式處理人文知識，會造成新的「知識利用門檻」，即人文學者數位技術能力的缺乏，難以發揮相對應的優勢。作者對資訊技術對文史學者造成門檻的原因，有十分精闢的分析：「資歷較長的學者其學術養成過程並無數位學習環境，與新科技間的疏離自不在話下。年輕學者與資訊科技的隔閡，部分源於國內學科分流過早，人文學學生缺乏自然科學訓練，對於科技陌生疏離，甚至懼於接受。部分也與年長人文教師習於傳統訓練方式，較少利用數位化資源豐富教學有關，年輕學子面對新的學術資源，多僅能自行摸索，不易建立有系統性而專精的應用能力。」這種出於研究習慣和科技恐懼的限制，在作者看來，反而讓人文學者在數位時代進行人文研究時，不如自然或社會科學學者，因為他們本來便長於科技和理論，一旦對人文議題感興趣，轉換跑道的難度會減低很多。也因此，黃教授警告：「因大量數位資料資源的出現，或將有助人文學界開展議題、深化研究質量，但此願景尚須面臨其他優勢學科的競爭；倘使人文研究者無法認知此一情況，未來當自然或社會領域學者逐漸將研究觸角及於人文領域，人文學者的學科優勢則將明顯消退。」

人文學者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挑戰呢？黃教授提出了許多建言，包括在學者養成階段改變教學訓練的方式、文史學者積極投身數位工程等等，最關鍵的，還是首重對自身研究領域的專業訓練之強化，「（史學研究者）若企望保有學術競爭優勢，則

更應加強史料來源的掌握與研讀能力，改變過度倚賴詞彙檢索的偏頗風氣。尋找自身關懷且具有時代或環境意義的問題，掌握與之結合的關鍵資料群……將資料還原至原有時空脈絡中，充分瞭解史料內涵與當時社會關切的事物，以顯現具有時代意義的論題。」易言之，人文學者必須要確立人文研究的學科主體性，才不會主客易勢，迷失於各式數位資料庫當中。

不同於紙本，在演講的過程中，黃教授特別突顯資訊學者與人文學者合作的模式，他特別以謝清俊和毛漢光兩位教授的合作，說明中研院的「漢籍全文資料庫」的成功，很大的原因便是在其前身計畫「史籍自動化——〈食貨志〉輸入電腦」執行過程中，謝、毛兩位教授彼此的尊重和互動，讓數位和人文的結合成為可能，之後不管計畫如何擴充，這樣的合作模式提供了堅實、穩定的基礎。事實上，無論在演講或紙本中，在研究習慣的改變上，黃教授都直接點出人文研究者應該跳出過往單打獨鬥的研究習慣，以跨領域、跨學科、跨時段等團隊合作的方式，去因應數位時代人文研究的挑戰：

一旦研究習慣改變，數位資源實有助於研究者推動跨領域的團隊研究。目前人文研究仍以個人發揮創見式的獨立研究為主，這與人文學科強調個人對資料的深入理解與意見闡發的傳統有關。然而，往昔學者可憑藉的史料典籍較少，以個人之力所能涉獵的資料廣度亦有所不足，因此所論多專，難於遍蒐長時期跨越斷代的資料，以議題為中心進行深入的長期觀察，尤難與其他領域學者進行跨領域合作。如今，大型資料庫內容無所不包，所涉領域甚廣，若能合理規劃議題，透過史料研讀，共同學習，當能跨越斷代或學術領域，推動中、大型或跨領域研究。

黃教授的論點和分析，兼及數位和人文兩方面的實務經驗，是十分具有洞見的觀察，對多數投身數位人文嘗試的研究者而言，一定都會贊同黃教授的想法。這種團隊的運作，絕非只是取巧，一個好的數位人文團隊，要能充分、有效的對話，雙方都必須有一定準備，不能僅專注在自己的領域裡，人文學者必須對資訊技術有基礎的理解，資訊學者則對人文議題有基本的認識，更重要的雙方都必須不斷增進自己的專業素養，並保持對另個領域的開放心態。在這樣的一個團隊裡，沒有主從或發號施令的問題，而是一起摸索、一同深入，一旦這樣的運作成立，其實就形成了一個數位人文運作模式的縮影，不斷擴充和發展，數位人文才能有真正發光發熱的一天。

讓我們再回到余英時教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一文中，所提及的「切己」的觀念，團隊合作的模式，其實正呼應了類似的訴求。在學科分流日趨細緻的今日，尤其數位和人文都是十分巨大而困難的領域，要僅憑一人之力將兩者

加以窮盡，無疑是有些困難的。故研究者所能做的，只能先確立自身研究的範疇，以及和此範疇相關的技術。數位人文要能成立亦是如此，兩個領域的學者都必須先對各自領域有足夠的專業知識，然後以開放和學習的心態去學習、理解雙方的交集之處，這「交集之處」即是「切己之處」，也是「史無定法」的具體運用和展現。總而言之，數位人文作為人文學的新風貌，對人文議題的關懷是永遠不變，而如何切入、理解、分析、推論的方法，則是永遠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不斷在變化之中。人文的價值是不容動搖的堅持，方法的開發是不會止息的演進，這種「變」與「不變」共生並存的狀態，本就是人文學的特質，而在數位人文裡將被更加彰顯。

## 四、結語

筆者曾經服務過的臺灣大學圖書館，將歷年所有的碩博士論文統一收藏在地下一樓「博碩士論文暨指參專室」裡，這些研究生們的心血，共同集結於一室，可說蔚為大觀。歷史學研究所的碩博士論文置於該房間的最角落，佔了兩面書架，從中隨手便能抽出許多寫成於民國50、60年代的論文，它們或是手寫、或是油印，字紙皆已泛黃，可以明顯看出它們和一同陳列的、寫於近十幾年論文的差別；今日每一篇論文都是用Word或類似軟體打成，清一色的新細明體。不僅於此，如果細究內容，我們相信已有許多研究者開始應用Excel、Access、Endnote、Zotero、ArcGIS、Xmind等軟體對論文資料進行處理，我們早已無法回去那個單靠紙筆完成論文的「手工業時代」了。儘管那時代其實並不遙遠，今日1970年代出身的研究者，多少都還曾經歷過那用稿紙「爬格子」來進行論述、繳交報告的時光。

數位科技的發展，在不知不覺中，已然改變了史學研究——或人文學的研究習慣。這當然是形式上的變化，和數位人文所主張的藉由科技發掘人力所難見的線索仍有所出入。然而，一來那麼龐大數量的形式變化，那麼多數位工具的使用，很難令人相信完全不會有任何一絲「質」的變化。二來至少這現象表明了在這短短的數十年間，資訊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人文學者與其刻意視而不見，自擯於浪潮之外，倒不如選擇欣然接受，於潮流之中去蕪存菁，為人文研究帶來更多的助益。相當程度上，數位人文的種種方法和訴求，只是上述工具的再進一步，而且還是以人文為起點的前進，對研究方法而言，是有益而無害的。

是以，或許關鍵不在於對數位人文方法的接受與否，識者所該深思的真正課題反而是什麼是人文學最核心、最關鍵的變與不變，於不變處鉤深索隱，精益求精；於可變處廣納百川，與時俱進。總而言之，不管我們將數位人文視為一種新穎的工具，或是一個充滿潛力的新範疇，它都將承繼、分享著人文學的價值和觀念，就如同那並陳於同一書架，年代跨越五六十年代的論文一樣，它們或許形式上有明顯的不

同，但對人文世界的關懷卻是一致的。「蛇化為龍，不改其鱗」，數位人文是數位時代人文研究的一種新的方式與選項，是一種助益而不是傷害，它分享人文學不變的堅持和執著，也體現著人文學對方法的開放和創新。這變與不變的掌握，將會是投身於此領域的學者所全力以赴的最大挑戰。

## 參考文獻

- 余英時，1982，〈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與傳統》，頁1-29，臺北：時報文化。
- 項潔、涂豐恩，2011，〈導論——什麼是數位人文〉，收於項潔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頁9-2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黃寬重，2012，〈數位時代人文研究的衝擊與蛻變〉，《漢學研究通訊》，31：1（總121期），頁1-6。

